

“通肩式”、“右袒式”佛衣在汉地发生的变化及成因考*

● 费 泳

摘 要：“通肩式”和“右袒式”是古印度佛像仅有的两种袈裟披着样式，可依据律典、经典和造像实物对上述两种袈裟披着样式的具体披法进行探究，汉地的自然环境和 cultural 习俗对“通肩式”和“右袒式”披法的变化有着内在的关联。

关键词：佛像；通肩式；右袒式

文章编号：1003-2568(2010)03-0100-08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作者：费泳，美术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 邮编 210013

一、“通肩式”和“右袒式”佛衣的基本披着方式

“通肩”和“偏袒”是律典中规定沙门袈裟的两种披法，其中“偏袒”在律中又称作“偏露右肩”或“偏袒右肩”，今人多以“右袒式”或“袒右式”称之。僧人着“右袒式”袈裟多用于礼拜、忏悔等场合，以示恭敬。“通肩式”则多用于诵经或出入市井之地时披着，以示袈裟福田之相^①。这两种披着方式在佛像中的应用最早见于古印度佛像，并成为印度佛像袈裟一以贯之的披着样式。

两种样式传入中土后也是汉地早期佛像衣着的基本样式。此基础上，随着佛教造像的民族化进程，汉地南北方又演变出诸多袈裟的新式披法，已为学界赋名的诸如“半披式”（或称“偏衫式”）、“垂领式”、“褒衣博带式”、“敷搭双肩下垂式”、“钩纽式”等，而传统的“通肩式”和“右袒式”在此进程中也未消失，并发生一系列微妙的变化。由于“通肩式”和“右袒式”实际已成为研究汉地佛像佛衣演变

的参照，对其原形的明确及其发展变化的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

律典中对袈裟作通肩和右袒两种披着方式有具体规定。概要地讲，“通肩式”是以袈裟横披覆盖双肩，“右袒式”需裸露右肩右臂。两种样式的袈裟右上角（图1）披着完成时要敷搭于左肩，披者左手需握住位于身体左侧下垂的两衣角，且两衣角要反折后握于掌中（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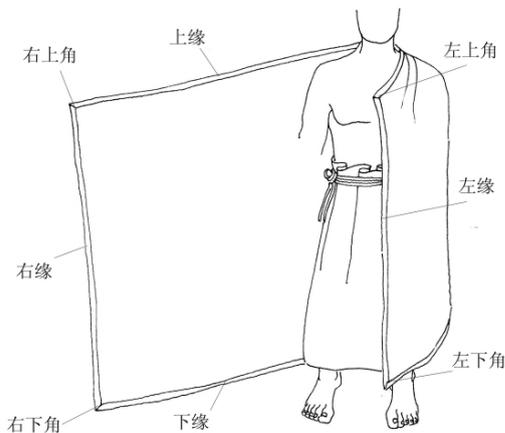


图1 袈裟部位示意图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佛教艺术中的佛衣样式研究》（项目批准号 08BF39），并得到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项目批准号 08SJB7600005）。

①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二衣总别篇）：“初听偏袒者，谓执事恭敬故，后听通肩披衣，示福田相故。律中至佛前上座前，方偏袒也，经中通肩披衣。”唐道世《法苑珠林》（仪式部）：“如在佛前及至师僧忏悔礼拜，并须依前右袒为恭。若至寺外街衢路行，则须以衣覆肩不得露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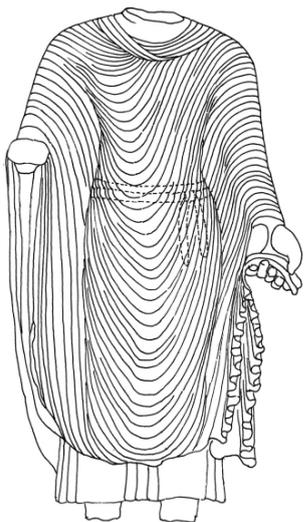


图2 印度笈多时期林菟罗造像

2)。《摩诃僧祇律》：“齐整被衣应当学，齐整被衣时不得如缠轴，应当通肩被着，纽齐两角左手捉，捉时不得手中出角头，如羊耳。”佛像在具体表现左手握衣角这一特征时，是将两衣角反折握于掌中，以避免律中所忌两衣角如羊耳的发生。对袈裟右上角搭于左肩这一特征尤需加以关注，在南北朝以后有关佛教律典著述中多涉及此问题，这也是考察汉地佛像中“通肩式”和“右袒式”袈裟变化的关键因素。

唐道宣在《律相感通传》中明确指出了袈裟的披着特征：“且三衣右角皆在左肩。”^①“余见古之瑞像，今此方见制者，莫不以衣搭于左肩，然始后取衣角共左臂内衣角，屈而捉之。”宋元照在《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中对道宣《律相感通传》注解表述得更为精详：“令以衣角达于左臂（达即到也）。置于腋下，不得令垂如上过也（今须准此，乍可排着左肩。若垂臂肘，定判非法，步步结罪。旧云：今在左臂为正，但不得垂尖角者，非也）。”

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云：“若对尊容事须齐整，以衣右角宽搭左肩，垂之背后，勿

安肘上。若欲带纽，即须通肩披，已将纽内响，回向肩后勿令其脱。以角搭肩，衣便绕颈。双手下出，一角向前，阿育王像正当其式。”

道宣、义净文中以“古之瑞像”及“阿育王像”作为袈裟披着之范例，中土“通肩式”造像实物可参看美国哈佛大学美术馆藏十六国时期坐佛（图3）、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后赵建武四年（338）坐佛、日本永青文库藏刘宋元嘉十四年（437）韩谦造像，及成都西安路出土梁太清五年（551）柱僧逸造阿育王像（图4），由造像正、背面图可以清晰地看到袈裟右上角均敷搭于左肩，而与左臂无涉。成都地区出土的诸多南朝时期的阿育王像^②，由于佛像手部大多残损，无法体现左手是否握有衣角，佛左手握衣角这一特征在汉魏时期四川崖墓、摇钱树中的佛像已得到体现。“右袒式”佛衣在汉地的出现较“通肩式”要迟，从日本私人收藏的北魏太和七年（483）立佛，可以看到袈裟右上角敷搭左肩和左手握有衣角在佛像中的应用^③。



图3 美国哈佛大学藏十六国时期坐佛正、背面

以上联系律典、相关经典及造像实物，基本可以确立佛像作“通肩式”或“右袒式”袈裟披着的两个特征要素：1. 袈裟右上角敷搭于左肩；2. 佛左手握衣角。

在古印度，贵霜、笈多时期佛像袈裟披着方式唯有通肩、右袒两式，袈裟右上角敷搭左

① 三衣即律中所说的大衣僧伽梨、中衣郁多罗僧及下衣安陀会。

② 成都西安路出土太清五年（551）柱僧逸造阿育王像。另有成都万佛寺出土阿育王像共7件，其中单体立像5件，头像2件，造像样式相同，为同一时期作品，其中年代可考的有北周保定二年至五年（562-565）益州总管造阿育王像。参见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简报》（《文物》1998年第11期）、袁曙光《四川省博物馆藏石佛寺石刻造像整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0期）。

③ 金申《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40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图4 成都西安路梁太清五年阿育王像正、侧面

肩,可以看出律典对佛像造制所起的决定性影响。但在佛左手握衣角方面,并没有统一的模式。“通肩式”和“右袒式”佛衣均传入汉地,并在此基础上随着佛教造像的民族化进程,演绎出诸多汉地自创的佛衣样式,但“通肩式”和“右袒式”并未在这一进程中消亡,其自身也发生着诸多变化。

二、汉地“通肩式”和“右袒式”佛衣的变化与成因

佛像传入汉地后,从现有的汉魏、西晋时期长江流域出土的造像中,可以看出“通肩式”佛衣是这一时期佛像袈裟表现的主要形式。并且从时间先后及地域分布来看,稍早的汉魏时期四川地区着“通肩式”的佛像多为左手握衣角,右手施无畏印。稍后魏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着“通肩式”的佛像多作禅定印,但同期少见“右袒式”,其中缘由值得关注,或许是袒露身体肩臂有违汉民族习俗,遂导致这一样式佛像的传入受到限制。

东晋、十六国时期,南方东晋时期的佛像实物出现缺失^①,北方十六国时期佛像资料显示,佛衣样式有“通肩式”、“右袒式”、“半披式”和“垂领式”,其中后两种为新出现的样式,属汉地自创。“半披式”佛衣在十六国时期已成为佛衣表现的主流样式,这也是汉地佛像中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佛衣表现形式,始终伴随着其后中土佛像的发展演变^②。“垂领式”的影响力远不及“半披式”,十六国至唐代常出现于对七佛及千佛的表现,之后趋于式微。

就“通肩式”和“右袒式”佛像而言,十六国时期“通肩式”仍是较为主要的表现样式,在炳灵寺169窟、凉州石塔及金铜佛等造像中均呈现出其重要的地位。十六国时期“右袒式”佛衣表现较少,炳灵寺169窟中仅见第14龕三佛中间一佛,在稍后的北凉石塔中也有表现,如敦煌□吉德塔(421-428)及酒泉马德惠承阳二年塔(426),两塔上刻有着“右袒式”袈裟的佛像,有学者认为“右袒式”佛衣在428年之后的北凉石塔中趋于消失^③。现有实物资料显示,“右袒式”佛衣似已为国人在此基础上改造出的“半披式”佛衣所取代并得以盛行,这在云冈、麦积山、莫高窟三地早期佛像中均有体现。

南北朝早期,佛衣的主流样式仍为“半披式”和“通肩式”,中期为“褒衣博带式”取代,晚期,“褒衣博带式”佛衣又被“敷搭双肩下垂式”和“褒衣博带演化式”所取代^④。可以看出,“通肩式”在南北朝早期一度兴盛之后就趋于沉寂^⑤,其再度兴起是在隋唐。“右袒式”在南北朝早、中期一直处于佛像表现的次要地位,至南北朝晚期,在天龙山、青州等地开始涌现。

隋唐时期,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之前因地缘政治导致的造像上的地域差别趋于消

① 南方东晋时期佛像仅见江西南昌火车站考古发掘出的四枚金戒指上篆刻的佛像,着衣样式不甚清晰。见《南昌火车站东晋墓葬群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2期。

② 费泳《佛衣样式中的“半披式”及其在南北方的演绎》《敦煌研究》2009年第3期。

③ 殷光明《北凉石塔分期试论》《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

④ 参见杨泓《试论南北朝前期佛像服饰的主要变化》《考古》1963年第6期,杨泓《关于南北朝时青州考古的思考》《文物》1998年第2期,费泳《佛衣样式中的“褒衣博带式”及其在南北方的演绎》《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2期。

⑤ 南北朝晚期南方成都地区出现了一些着“通肩式”袈裟的阿育王像,北方如北响堂山北洞和中洞的中心柱上也出现有“通肩式”佛像,但同期南、北方出现的“通肩式”佛像,已不能代表当时佛像的主流表现形式。

失。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产生的诸多民族化佛衣样式，此间大多成为佛教造像的主要表现形式，中国佛教艺术鼎盛时期所呈现的包容性，通过佛衣样式的表现可见一斑。“通肩式”和“右袒式”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佛衣样式，其中“右袒式”伴随印度密教造像的传入而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①。同期“通肩式”和“右袒式”佛衣在披着方式上与印度样并无二致(图5)。



图5 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坐佛正、背面

唐以后“半披式”成为佛像衣着最为常见的表现形式，在此背景下，佛像中“通肩式”佛衣的表现趋于式微，而“右袒式”较之前有所增加。元、明、清三代出现了大量风格深受尼泊尔及中国西藏佛教造像影响的“右袒式”佛像。

以下就“通肩式”和“右袒式”佛衣在佛像发展进程中的具体变化予以探析。

1. “通肩式”袈裟右衣角垂挂左臂

汉地佛像中，“通肩式”袈裟右衣角垂挂左臂的较早实例，见于炳灵寺169窟第9龕三立佛中最西向立佛^②(图6)，该佛左手握衣角，袈裟右衣角垂挂左臂，形似象鼻，这一披着方式不见古印度佛像表现，应是较典型的律典忌讳的袈裟披着呈“象鼻相”在佛像中表现的案例。律典及相关经典对袈裟披着中的象鼻相多有评述，《摩诃僧祇律》例举了诸多释门所忌讳的袈裟披着方式，其中就有“象鼻者：一角偏垂”。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不得垂三衣前角。注云，不排着肩上，而



图6 炳灵寺169窟9龕西向立佛

垂臂肘前(以垂臂上名象鼻也)。”道宣《释门章服仪》：“法衣披着，右角垂前……象鼻着衣，正篇明犯，理须反迹。”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袈裟角垂正当象鼻，梵僧纵至皆亦雷同，良为绢滑堕肩，遂令正则讹替。”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前垂一角，为象鼻相，人不思罪，习久谓法。”

另据道宣《律相感通传》载，释迦在最终为沙门确立将袈裟右衣角搭于左肩之前，曾就如何安固袈裟右衣角凡经四制：最初释迦将袈裟右衣角敷搭左臂(此一制)；后因比丘着此衣，风飘洒脱多为女爱，遂将右衣角改置左肩后，并用坐具“尼师坛”镇之以防衣角滑落(此二制)；由于外道非议用坐具“尼师坛”置袈裟之上有损袈裟之大威灵，释迦遂改回一制(此三制)；又外道讥言第三制着衣不整，犹如象鼻，导致释迦最终确立给袈裟安钩纽以固定右衣角，且右衣角需置于左肩的规制^③(此四制)。

可见如何安固袈裟右衣角也一直是困扰释迦和沙门的问题。右衣角如果将左臂敷盖，所呈现的象鼻相，会使袈裟披着显得轻佻，有损佛门威仪，后为律典所忌讳。

袈裟披着呈“象鼻相”在炳灵寺169窟中

① 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351-354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12月。

② 有关炳灵寺169窟龕号参见阎文儒、王万青编著《炳灵寺石窟》2-3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 唐道宣《律相感通传》《大正藏》第45册。

实际并不限于上述“通肩式”一例,该窟出现的许多着汉地自创的“半披式”佛衣的佛像也多呈现这一特征,由于不属“通肩式”范畴,故不详述。但同期佛衣大量出现“象鼻相”是否与汉地丝织品融入袈裟面料存在关联,仍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①。

需要指出的是袈裟作象鼻相在现存古印度佛像并未得到反映,炳灵寺169窟第9龕这身变异的“通肩式”披法在该窟诸多“通肩式”佛像中亦属孤例,169窟北壁第7龕主尊立佛及北壁第3龕主尊坐佛,均为“通肩式”,袈裟右衣角被置于左肩后。

2. “通肩式”袈裟左下角和右下角垂挂左前臂

汉地“通肩式”佛像出现袈裟左下角和右下角垂挂于左前臂,较早出现在北朝早期,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菟申造立佛(图7),这身金铜佛应是北魏武帝灭佛前的作品^②。与该像佛衣披着样式极为相似的另有一身纪年为北魏太和元年(477)的金铜弥勒佛像,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在衣纹处理上较菟申造像更为规整和程式化。这两身佛像袈裟右上角均敷塔左肩,其变化主要体现在对袈裟左下角和右下角的处理上,即位于佛像身体左侧本应握于左手的佛衣下垂两衣角,被置于佛的左前臂上,而腾出的左手则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秣菟罗和犍陀罗着“通肩式”袈裟的立佛左手大多呈握衣角状,这一特点也为十六国时期立佛继承,至南北朝时期发生了变化。

在五世纪末至六世纪中期的近半个世纪,约当南北朝中期,南方长江流域及北方中原地区石窟寺佛像袈裟多为“褒衣博带式”一统,此间民间流行的一些小型金铜佛及背屏石佛造像,仍能看到“通肩式”披着。其中一类左手施与愿印的立佛,袈裟的披着方式的变化均与上述太平真君四年菟申造像类同,如



图7 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菟申造像正、侧面

太和十六年(492)王虎兄弟造弥勒立像;另有一类符合规制,左手握衣角,如太和二十三年(499)僧欣造弥勒立像。

3. “通肩式”袈裟出现钩纽

“通肩式”佛衣在南北朝晚期的青州地区发生了新的变化,即通肩披着的袈裟出现了钩纽配饰(图8)^③。将钩纽用在“通肩式”佛像中,以现有实物资料看,最早发生在青州地区^④,为国人所创。“钩纽”是袈裟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分律》第三分“衣捷度”中,有关袈裟的制作,涉及浣洗、染、辗治、安缘、裁隔、编边、安纽、作叶、安钩等多项工序。钩纽是将袈裟右衣角安固于左肩的有效手段。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也明确表述,钩纽用于袈裟通肩披着,并且钩纽系襟应内藏于左肩右衣角之下。依照律典,通肩披着时钩纽应被隐于袈裟右衣角下。这可能是印度佛像未对钩纽加以表现的原因,青州佛像右衣角是系吊于钩纽之上,并未甩搭于肩后,所以严格意义上讲,青州地区此类通肩饰钩纽的佛像,是对律典规制予以变通的产物。

① 费泳《佛像袈裟的披着方式与“象鼻相”问题》,《敦煌研究》2008年第2期。

②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三月下诏灭佛,至文成帝即位(452)下诏复兴佛法,《魏书·释老志》3033-3036页,中华书局,1974年。

③ 与该图类似的通肩饰钩纽佛立像,还见于青州市博物馆藏佛像(中国历史博物馆等编《山东青州龙兴寺出土佛教石刻造像精品》93页)。学界亦将饰钩纽的袈裟披着方式物称“钩纽式”,参见马世长《汉式佛像袈裟琐议》,《艺术史研究》,2005年第7辑。

④ 山东历城四门塔内东侧、南侧两尊东魏坐佛,均着“敷塔双肩下垂式”佛衣,二佛最外层袈裟也饰有钩纽。



图8 台北藏青州北齐立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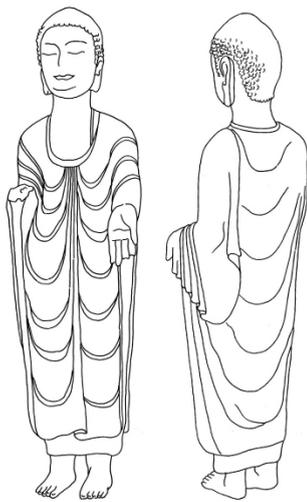


图9 保利藏青州北齐立佛正、背面

此外,南北朝晚期“褰衣博带式”佛衣发生了演变,其外观与天竺通肩衣甚为相似(图9),有必要加以关注。“褰衣博带演化式”与天竺通肩衣区别的显著特征是袈裟右上角将左肩、左臂一并覆盖,而不仅敷搭左肩,对此笔者已专文阐述^①,两种佛衣披着方式的文化内涵有本质区别。“褰衣博带式”佛衣的演化形式或称为“褰衣博带演化式”,是由褰衣博带式佛衣演化而来,其演变轨迹有向天竺通肩衣回归的趋势,其发生地区应在南朝,向东北影响至山东青州地区,向西北影响至麦积山和莫高窟,与当时主要流行于东魏、北齐境内的“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形成对峙局面。当“褰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在南朝出现时,南方成都地区仍在大量出现着天竺通肩袈裟的阿育王像。

4. “右袒式”袈裟左下角和右下角垂挂左前臂

“右袒式”佛像出现将袈裟左下角和右下角垂挂于左前臂,较早亦见于北朝早期佛像,发生时间与“通肩式”佛衣出现这一特征相近,对袈裟右上角和身体左侧下垂两衣角的处理,也与菟申造像相同,如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耿崇造弥勒立佛,与之相似的还见于稍后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弥勒立佛,由此

可以看出同期北朝对“通肩式”和“右袒式”佛衣细节处理上的相似之处。

将袈裟衣角垂挂于左前臂是汉地佛像的特色,不同披着方式对具体垂挂衣角的选择有所不同,在炳灵寺169窟9号龕西秦佛像中,出现了“通肩式”佛衣将袈裟右上角连同左臂、左肩一并覆盖的现象。在同窟诸多“半披式”佛像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披着方式。至五世纪中期,北方金铜佛中的“通肩式”和“右袒式”佛衣,约同时出现了将袈裟下垂两角敷搭于左前臂的表现方式,腾出的左手通常用作施与愿印,约五世纪末兴起的“褰衣博带式”佛像则将袈裟右上角敷搭左前臂。已有实物资料显示,汉地佛像左手施与愿印兴起的时间是在北魏太平真君初年,具体反映在着“通肩式”和“右袒式”佛像中,而伴随这一手印出现的,即是“通肩式”和“右袒式”袈裟披着方式的改变。

5. “右袒式”左肩前垂布状物

“右袒式”佛像在南北朝早、中期出现甚少,南北朝晚期北齐境内的天龙山及山东青州地区开始出现较多的“右袒式”佛像,其中青州地区部分“右袒式”佛像衣着发生的变化值得关注,这类“右袒式”佛衣的外观特征是袈裟左肩前垂布状物^②(图10),且左手臂裸

① 费泳《佛衣样式中的“褰衣博带式”及其在南北方的演绎》,《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2期。

② 杨泓《贴金彩绘佛立像》一文描述这类“右袒式”佛像左肩前垂之物是“袈裟上襟敷搭左肩下垂”,收录于《保利藏珍》153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露。青州地区已发现多身这种“右袒式”佛像，呈现出一种区域性的整体风格，并且这种风格同期似仅见于青州地区佛像，也未对隋唐造像产生影响。

佛左肩前垂布状物的现象 现有实物资料较早见于印度东部奥里萨宝山寺约七世纪佛像(图 11) 这也是南海诸国南传佛教佛像“右袒式”衣着特征之一，如斯里兰卡约八世纪坐佛及泰国十三至十四世纪“右袒式”坐佛^①。



图 10 保利藏青州北齐立佛正、背面

青州地区佛及菩萨的造像风格与南朝更为接近，在一系列造像因素如“褒衣博带式”佛衣的演变、佛像螺发的出现、菩萨宝冠、帔帛及璎珞的变化等均受到以四川成都为代表的南朝佛教造像的影响^②。由于尚缺南朝及印度等南海诸国六世纪中期同类佛像资料予以比对，青州地区佛左肩前垂袈裟左角的“右袒式”佛像是经由南朝间接传入或直接经海路由南海哪一国传入仍有待于进一步明确。

前文在讲到三衣披着方式时，提及释迦



图 11 印度奥里萨宝山寺佛像(七世纪)

为如何安固袈裟右衣角曾煞费苦心，凡经四制以后最终确立给袈裟安钩纽，且袈裟右角搭于左肩。此外，唐义净在其《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提到“然其薄绢为袈裟者，多滑不肯着肩。礼拜之时遂便落地，任取不堕之物为之，絅纣白氎即其要也”，由于丝质袈裟的盛行，初唐时期汉地沙门流行一种以粗绢或棉布镇压左肩袈裟衣角的现象。经查看青州地区左肩前垂布状物佛像的背部，可以看到前垂的布状物与背部袈裟融为一体，基本可以确定，前垂的布状物为袈裟之左上角。右袒披着是否要裸露左臂，律典中并无明确要求，将袈裟左上角压覆右上角前缀胸前，有违规制。

总体来看，北齐境内的“右袒式”袈裟被处理得较前期更为贴体和轻薄，对衣纹雕饰较少，显示出印度萨尔那特、斯里兰卡等地造像风格的影响。这可能与东魏、北齐统治者倡导“鲜卑化”和“西胡化”、南朝梁武帝崇尚天竺佛像的影响，及北齐增进与域外佛教造像的交流有关^③。

① 李玉珉《斯里兰卡与东南亚佛教造像艺术》一文认为泰国十四、十五世纪的此类“右袒式”披衣特征为“袍角自左肩垂下”，该文录入《金铜佛造像特展图录》25-34页，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7年印行。
② 杨泓《关于南北朝时青州考古的思考》《文物》，1998年第2期。费泳《“青州模式”造像的源流》《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
③ 有关东魏、北齐的“鲜卑化”和“西胡化”，参见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292-300页，黄山书社，1987年4月。据杨銜之《洛阳伽蓝记》描述，北魏末年，来自西域“百国千城”的胡人定居于洛阳，当时东洛已是“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另据法显《佛国记》、《高僧传·佛陀跋陀罗》、《高僧传·昙无讖》载，青州地区晋宋年间已辟有两处出海港口，分别是长广郡和东莱郡，并有僧人由此循海路往返于天竺和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对青州地区佛像的风格成因，参见杨泓《关于南北朝时青州考古的思考》（《文物》1998年第2期）、金维诺《简论青州出土造像的艺术风范》（《山东青州龙兴寺出土佛教石刻造像精品》24-25页）、宿白《青州龙兴寺窑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二》（《文物》1999年第10期）。

6. “右袒式”袈裟右上角垂挂左臂

将袈裟右上角垂挂左臂律典中称作“象鼻相”，汉地佛像出现“象鼻相”较早见于炳灵寺 169 窟第 9 龕“通肩式”立佛着衣。“象鼻相”在“右袒式”佛像的表现较早见于青州地区北齐立佛（图 12），这一特征与青州同期“褒衣博带演化式”对袈裟右衣角的处理方式相同，二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联。结合青州地区“右袒式”佛衣左肩前垂布状物这一特征来看，青州地区“右袒式”佛衣呈现出富于变化的地域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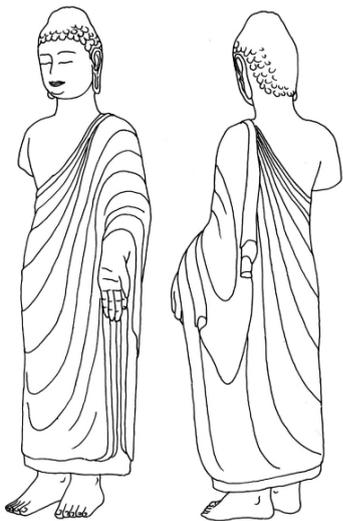


图 12 保利藏青州北齐立佛正、背面

7. “右袒式”大布垂挂左肩

汉地元、明、清三代出现许多受藏传佛教造像影响的“右袒式”佛像，特征是在袈裟的左肩垂挂一块大布将左半身覆盖（图 13），此样式多出自藏西和藏南，并在尼泊尔等国约十二世纪前后的佛像中广为流行^①。其源头最早可能出自南传佛教僧人以大衣僧伽梨镇压左肩的着衣方式，至今斯里兰卡等地沙门仍有在右袒披着的左肩之上镇压僧伽梨的习俗。

用大衣僧伽梨镇压左肩确可在律典中找



图 13 故宫藏西藏或尼泊尔约 14 世纪坐佛正、背面

到依据《四分律》多次强调这一则事件：“我欲入村，彼当洗手，已衣架上徐徐取衣，勿使倒错。当取安陀会舒张抖擻看，勿令有虫蛇蜂诸恶虫。次取腰带、僧祇支、郁多罗僧舒张抖擻看，勿令有蛇蜂诸恶虫，当授与和尚，应迭僧伽梨着头上若肩上，复次取钵。”从中可以看出，沙门出入村落时，最外层大衣僧伽梨可以叠好后置于头上或镇压肩上。至今南海诸国南传佛教一脉沙门仍在遵守这一戒律^②。针对这类披着方式需要明确的两点是：1. 这类用僧伽梨镇压左肩的做法，无论是佛像还是今天所见南海诸国僧人，袈裟披着均为“右袒式”；2. 以僧伽梨镇压左肩，虽然有律典为依据，但在古印度佛像表现中难觅其踪。

由于佛教自印度传出后，所经之地的自然气候与文化习俗存在差异，以及对戒律的不同理解和应用，这些因素均可能对佛像衣着的表现产生影响^③。佛衣中的“通肩式”和“右袒式”以其对律典及佛教原教旨的恪守，得以在汉地佛像衣着的历次民族化改造进程中生存下来。探寻其在汉地各时期表现规模及形式上的变化，能看到与汉地佛衣的民族化进程、汉地与域外的佛教文化交流及佛像传播格局的转变密切关联。

① 约 13 世纪中期，尼泊尔人阿尼哥曾率 80 位工匠赴藏建塔，随后又赴蒙古谒见世祖忽必烈，《元史·阿尼哥传》载：“两京寺观之像，多出其手。”时人“叹其天巧，莫不愧服”，至元十年（1273）授人匠总管，十五年（1278）授光禄大夫。

② 今南海斯里兰卡等国僧人，多有以僧伽梨镇压左肩后，再用带饰围束腰部。

③ 袈裟无论是作通肩或右袒披着，对其右衣角的处理向来困扰着沙门法衣的披着，并进而可能影响到佛衣的表现。据道宣《律相感通传》载，释迦在最终确立将袈裟右衣角敷搭左肩之前，就如何稳固右衣角于左肩，凡经四制，遂有以尼师坛镇压左肩，或以钩纽系襻右衣角等方式的产生。另据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载，佛教传入汉地后，由于丝质材料融入袈裟面料，又有以布或粗绸镇压左肩，以防右衣角滑落。